

超文本及其语篇特征

胡壮麟

(北京大学, 北京 100083)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643(2004)05-0003-06

1.0 超文本技术

超文本的概念孕育于1945年,当时Vannevar Bush写‘As We May Think’一文,他在文中想象一个书桌样的工具,称之为“memex”(记忆扩展器, memory extension的缩写)。在战时科学的环境下,科学家和技术人员需要处理大量的知识,不时抱怨索引系统的非真实性和缺点。这时, Bush意识到“人类智慧不是这么工作的。它通过联想操作。”为此,他要发明的“memex”是这样一种器械,个体可以把他所有的书,记录和通信内容储存下来,可以机械化地以最快的速度 and 灵活性检索资料,“偶而使用者可以插入自己的评论,“通过可利用的材料建立自己所感兴趣的事物的轨迹”,加以储存,供以后参考使用。在这个意义上, memex 是可以反映大脑细胞的轨迹网。可惜, Bush 关于 memex 的概念在实施中被耽误了,因为当时使用的是缩微胶卷。(Berk & Devlin, 1991; Whitehead, 1996)

继 Bush 后, Ted Nelson 1965 年在一次美国计算机协会的报告中创用“超文本”(hypertext)一词。它包括三个方面: (1) 这是一种电子文本的形式; (2) 一种崭新的信息技术; (3) 一种出版形式。他说“关于超文本, 我指无序的写作——枝叶蔓生的文本, 它可由读者选择, 在互动的屏幕上阅读效果最好。如大家所看到的, 这是一系列的文本块, 由可供读者选择不同通路的链接点连接而成。”(Nelson, 1990) Nelson 曾患注意力缺乏障碍的疾病, 受干扰时常会健忘, 在许多关联事物前找不到北, 因而他创造了超文本的概念, 希望它成为追踪自己思想的记忆策略。Nelson 设计了一套叫做 Xanadu 的系统, 由于期望值过高, 未能进入市场应用阶段。(Whitehead, 1996)

最后实现超文本思想的是 Tim Berners-Lee, 他

1989年在CERN的互联网上以“万维网”(World Wide Web)的形式出现。超文本可链接世界上所有其他含有信息的计算机。在万维网上从可激活任何一点进入另一个点; 一个信息单位可以连接到世界上任何其他地方。万维网是对它先前的所有信息资源的抽象。公司和个人如果不与互联网连接, 很难继续活动。像恐龙一样, 在这种环境中, 或进化, 或死亡。这样, 人类文化经历了口述文化(手稿文化(印刷文化(电子文化, 最终进入了超文本文化, 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感觉和社会结构。在超文本文件中, 人们可以寻找独特的径路, 激活某些链接点, 建立新的链接点, 按照理据、逻辑、幻想、好奇心或碰巧, 在空间世界活动, 如送电子邮件, 下载图象或文本, 收听录音材料等等。

由于“网络”、“互联网”、“万维网”、“链接”等都要通过超文本体现, 因此人们更多的以“超文本”来涵盖这方面的讨论。

2.0 超文本的哲学思考

尽管超文本的术语在1965年出现, 而技术上通过万维网在1989年才突破, 后现代主义的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很快捕捉到超文本思想的划时代意义。

2.1 Derrida

Derrida 在 1967 年提出“链接”(liaison/link), “网”(toile/web), “网络”(réseau/network), “交织”(s’y tissent/interwoven), “方阵”(matrix)等今天看来属于超文本的词语。Derrida 强调文本的开放性, 互文性, 以及对某文本的内外进行区别的不相关性。Derrida 预见到未来将出现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更为丰富的文本形式, 一种比我们潜在经验也许实际经验更为真实的形式, 决定于分立的阅读单位。正如 Derrida 所说, “每一种符号, 语言的或非语言的,

收稿时间: 2004-10-18

作者简介: 胡壮麟(1933—), 男, 汉族, 教授,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外国语言学、系统功能语法。

口述的或书面的,都可以引用,放在括号之间。”这种可引用性、可分割性对超文本至为重要,“这样做它可以脱离每个给定文本,在新的语境中,以绝对不可限制的方式,无限孳生。”(Landow, 1992: 8-10) Derrida 在 1976 的英文版中的许多观点与今天超文本和互联网的物理特性极为吻合。例如,他有关文本的“相互交织的质地——一网套一网”,谈的就是“散布”(dissemination)。Derrida 认为自然的一切就是一本大书,所有其他文本或书籍都出自该书。这就是今天的互联网。互联网的每一个文件只是整体的一部分,并与整体中的其他部分链接。Derrida (1976: 301)也谈到“切割”(scission),“用裁纸刀任意插入,这样阅读过程可以毫不经意的这样那样地进行。”我们随便进入一个文本就是超文本的重要特征,它没有固定的起点或终点,因此它可认为处于固定时间之外,这与 Derrida 有关“序言”的概念相似。(Rowe, 1999)最后, Derrida (1976: 86-87)也谈到非线性写作的出现,意味着线性写作的终结,也就是书本的终结。即使今天仍有书的形式,这一新的写作方式,文学的或理论的,已经诞生了。人们已不再受制于一行一行写作,人们可以根据不同的空间构成,重读已经写过的东西。

2.2 Foucault

Foucault 在 1972 和 1973 的两部著作中都提到“network”和“link”。例如,在讨论历史叙述时,他一方面提出历史叙述的传统概念是对过去的事件系列按顺序排列,另一方面又提出历史叙述的产生和话语形成(discursive formation)关系,“反复的重新分布显露出若干个过去,若干个关联形式,若干个不同层级的重要性,若干个决断的网络。”(1972: 2, 3)这就是说,单一的,历时的线性的叙述方式已不能如实地反映话语的形成过程。话语的事实需要和其他事实放在一起分析。后来,他又明确地指出,他的目标是“根据人们对问题的重新提出,打乱人们的思维习惯、他们办事情和想事情的方法、消除他们习惯的和已经接受的东西、重新审视规则和制度。”(1988: 265)可见 Foucault 把文本看作网络,“人们必须重新构建总的思维系统,从正面说,它使即时的和有明显对立的意见相互交流成为可能。正是这个联结可以说明导致对立或问题的条件,它就是知识的历史性。”(1973: 75)。对 Foucault 来说,“顺序”部分是“内部的法则,隐蔽的网络”(1973: xx);因此,“网络”是能够“链接在一起的”现象(1973: 127)。

2.3 Bakhtin

据 Landow (1992) 的报道, Bakhtin (1963/1984) 使用了“links”, “linkage”, “interconnectedness”, 和“interwoven”等词语。更主要的是, Bakhtin 有关对话, 多声部的小说可说明读写与新的超文本形式的关系。Bakhtin 认为这种小说“不是把其他意识作为物体吸收到单一的意识中, 作为整体构建的, 而是若干个意识的互动, 其中没有一个完全成为其他意识的物体。”Bakhtin 对多声部文学形式的描写把 Dostoevsky 小说展示为超文本小说, 在小说中个体的声音采用 lexias (网页) 的形式。如果说 Derrida 是从“字节”或“比特”来阐明超文本, Bakhtin 则从超文本本身及其力量来阐明, 凡一个声音、一个观点的典型或实例, 类似 Rorty 的那种对话。按 Bakhtin (1984: 18) 的说法, “就小说本身而言, 没有参与的‘第三者’没有以任何形式表现。在组成上或在作品的较大意义上, 没有给它们留出地方。”用超文本的术语说, 这指向这种信息方式的一个重要性质: 超文本不容许强暴的单个的声音。不如说, 这个声音总是来自对短暂聚焦中的组合经验的蒸馏, 人们当时念到的网页, 以及人们的阅读过程和连续形成的叙述。

总之, 在所有关于文学批评和写作研究的理念中, Bakhtin 的对话理论最能解释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正在出现的文本革命, 那就是印刷时代的静态的文本表述让位于电子时代的动态的文本。Bakhtin (1986: 170) 临终前在“Toward a Methodology for the Human Sciences”一文中写道: “没有第一个词或最后一个词, 也没有对话语境的限制(它延伸至无边界的过去和无边界的将来)。甚至过去的意义, 即产生于已消逝世纪的对话的那些意义不可能是稳定的(终结的, 一劳永逸的), 它们在对话的随后的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总是在变化(the renewed)。在对话发展的任何时刻, 遗忘的语境意义是大量的、剧烈的、无边界的, 但在对话随后发展的某个时刻, 会(在新语境下)被重新提起, 以更新的形式活化。没有绝对的死亡; 每个意义具有自己的回乡的节日。这是伟大时刻的问题。”

2.4 Barthes

Barthes 分析了超文本如何创造了新型的阅读经验, 即阅读可区分为“作者型”(writerly)和“读者型”(readerly), 这使我们能清楚地理解超文本对文学界和其他信息处理的重要转变。他说: “在这种理想文本中, 有许多网络互动, 不存在一个网络超过其它网络; 文本是能指的星系, 不是所指的结构; 它没有开始; 它是不能逆转的; 我们可以经由若干个入口接

近它,没有一个可以权威地成为是主要的;它动用的代码可延伸到眼睛所能及之处,它们是不确定的;意义系统可接纳绝对众多的文本,但这个数字是从不关闭的,因为它建立在语言的无穷尽之上。”

对此, Landow (1992) 评论道, Barthes 的这一区分基本上就是区分以印刷技术为基础的文本和电子的超文本,因为 Barthes 认为“文学作品的目标是使读者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文本的创造者。我们文学的特征是文学机制可怜地将文本的生产者和它的用户、拥有者和它的消费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相互分离。这样的读者被投入一种无所事事的境地——他是被动的;简单说,他是严肃的;它不是使自己活动,不是设法接近能指的魔力,接近写作的乐趣,而是处于不幸的自由之中,或者接受或者拒绝这个文本;阅读与公投差不了多少。与作者型相对立的是它相反的价值,它的负面的,反作用的价值;可以读,但不能写;即读者型文本。我们把任何读者型文本称为经典的文本。”(Barthes, 1970: 4, 6)

读者型文本展现的是流畅的线性的阅读,读者基本上是被动的。但作者型文本是非线形的,由无限的众多意义构成,能使“读者不再是消费者,而是文本的生产者。”在该文中, Barthes 也谈到内涵和外延的关系。科学话语寻求的是将某些阅读置于其他阅读之上。内涵容许“进入经典文本的多义性的方法”。因此,内涵是“一种决定,一种关系,一种照应,一种具有使自己与前、与后、与外部或文本外场所建立关系的力量的特征。”内涵远远胜过外延,因为“外延不是首先的意义,但缺被认为如此;在这种错觉下,它最终不过是内涵的最后意义(即要确定的和准备阅读终止时的意义)。”(ibid: 8, 9)

为了像读者型文本那样写作或阅读,保持对文本多义性的注意力,人们不能将文件或阅读构建成大块,而应当标注下来。这个经过标注的文本就是分割成意义块的文本,使“流畅的叙述话语”受到干扰。这里, Barthes 把这些碎片叫做“阅读单元”或屏页(lexias)。被选择的阅读单元是意义最为不同(至少有三四种意义)的单元,有种种内涵。Barthes 认为重新阅读可以产生意义的多元化,也显示反复阅读“不再是消化,而是游戏”的过程。这样,读者反复阅读一个文本时,不再寻找“真正”的文本,而是发现同一文本变“新”了。(ibid: 13, 15, 16)

Barthes 把阅读过程中所有文本所指区分为 5 种类别或阅读单元: 阐述意义或真实的声音——可单独存在; 义素或个人的声音——不与外界联系, 不稳定的; 结构或符号的声音——文本可从不同方面切

入; 动作或帝国的声音——诸如走路, 谋杀, 会面等; 文化或科学的声音——是科学或知识某部分的索引。这些不同的声音互相交接和冲突, 而这正是 Barthes 所喜欢的文本。

Barthes 在 1970 年写 *S/Z* 一书, 显然, 他多少知道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在他整个文本中, 我们可以发现有不少与计算机有关。例如, 他经常使用“可计算的”(computable)来描述信息散布的过程。在关于阅读单元的讨论中, 他使用“字节”(byte)这个字。更有趣的是他使用了“生物体系统”(cyborg), 指机器和有机体的杂交这个词语。总之, Barthes 的 *S/Z* 一书是超文本理论的重要著作。

3.0 超文本的语篇特征

Ong (1982) 曾经从心理文化的视角提出人类传递知识的四个阶段: 原生性口述(primary orality)时代; 手稿(manuscript or chirographic)时代; 印刷(print or typographic)时代和电子时代。电子时代即今天人们通称的超文本时代。由于电子时代呈现较多的口述特征, Ong 认为它的特征是次生性口述或第二轮口述(secondary orality)。那么, 基于电子技术的超文本和基于印刷技术的文本究竟有什么区别? 超文本的次生性口述与原生性口述又有什么区别? 这就需要弄清楚超文本的语篇特征。Bolter (1991), Landow (1992) 和 Lanham (1993) 先后谈到以下几点:

3.1 没有起点与终点的流动性

超文本是一种流动的、开放的形式, 在电脑显示器上出现, 又很快消失, 因为电子文本是不断活动的世界。超文本从来不是稳定的, 从来不与读者带给它的变化语境脱离。这与荷马口述史诗极为相似。对荷马来说, 诗歌是自发的表现, 不是固定的语篇。反之, 印刷词语往往是僵硬的, 因为印刷页面是固定的、静止的。据 Bolter (1991: 31, 43, 155), Landow (1992: 52, 207) 和 Lanham (1993: 16) 的报道: 阅读特别令人着迷的超文本小说, 是否按叙述序列决定于读者。Bolter (1991: 124) 观察到: “没有一个单一的故事, 每看一次是一个版本, 因为每一次阅读决定故事的进展。我们可以说没有故事, 只有阅读。”

3.2 不分读者与作者的融合性

超文本容许用户或读者参与他们所阅读的文本的建立。在决定应按何种程序进行或放弃时, 读者对如何形成文本拥有权力, 甚至改变文本在超文本环境中的形式。我们不再有传统印刷媒体赋予作者的线形特权。反之, 它被在协作和连接方面对用户友善的网络替换了。如同在口述文化中, 意义的产生依赖听众, 更甚于说话者。意义的合成发生在读者方面, 更甚于文本的作者。

这样,在互联网上,在漫游互联网过程的协作努力中,作者和读者之间的区别消失。读者和作者共享电子写作空间。读者可以参与回忆和解释每次阅读过程中的文本。电子读者在写作空间的角色与荷马时期的听众一样(Bolter, 1991: 59)。在口述文化中,作者的作用是不存在的;著作权只是写作的遗产。次生性口述使我们回到无作者文本的经验中,但作者控制一旦丧失,我们还不知道如何对待电子文本的“权威性”,因为我们习惯的是印刷文化的权威性(McLuhan, 1962)。例如,今天在互联网我们可以看到大量协作的项目,工作的完成分散在各个协作者手中,不可能说一定是谁的功劳,一些声誉好的科学研究,居然没有“作者”!如1990年科学家成功地分解到因子第9个费马数字。兰德公司的研究员Tora Bikson写道,“数学家和逻辑学家长期相信这个数字‘是可计算的’,因为它不能证明它是不能计算的,但它需要如此多的人和计算机资源,没有人真的试过。”又如,贝尔通信研究所的专家开发一个课题,分成多个项目,在互联网上招募研究人员。采用了电邮联系的方式,将问题分送各个研究人员,又从电邮上收回解决方法。将大家的建议集中起来,问题解决了,最后不知道该提哪些人作为成果作者。

针对上述见物不见人的情况, Bolter (1991: 182—84) 提出电子文化预示一种后现代的“万物有灵说”(animism)。Barlow (1994) 说, 我们已演变成信息的“猎人——收集者”(hunter-gatherers) (90); 其实, McLuhan (1962) 很早就把电子通信的影响说成是“重新部落化”(retribalization), 在“地球村”中我们回到部落的, 神话般的存在。“在所参与电子媒体的影响下, 线形的排印工人重新学习”神话般地生活。我们生活在一种意识形式中, 知识不存在于知者之外, 或体现在物质文本中, 而是戏剧般的、社团化地生活着, 如同口授时代的人所完成的神话那样。(Brent, 1996: 411—22)

需要说明的是超文本要求具有主动性的读者。作为超文本的消极读者是不可能的。甚至在限制最为严格的超文本中, 即解释型超文本中, 读者必须寻找和选择从一个链接点移向另一个链接点。在限制不大的超文本中, 即构建型超文本中, 读者有自由对现有文本注解, 在网络中增添新文本, 创建文本之间的新链接, 他常常通过操作橱窗、改变字体, 具有显著的权利来改变所有东西的出现。超文本的读者总是所阅读“文本”的共同作者, 有时成为主要作者。

电子词语的互动读者使有反应的读者人格化。电子读者可完成要他们做的所有的事情——或选择不做。他们可以增加或删除一个文本, 重新组合, 改

写和增补评语。创作者和评论家之间的界限消失了。(Lanham, 1993: 6)

3.3 没有中心与边缘的无中心论

超文本没有中心, 没有边缘, 没有内部或外部。对一个手抄本来说, 从周围的空白很容易区别一个页面中心的词语, 或从最后一页找到第一页, 或从书架上找到所要的书, 但这些物质性的现实事物, 与电子文本相比大变样了。在超文本网络中, 除第一节中没有起点没有终点外, 它也没有上或下, 没有内和外, 没有中心和边缘。当一个电子文本与另一个链接以后, 或一个文本被复制出来传给另一人之后, 各文本之间的间隔或区别的观点都蒸发了。其原因在于超文本是“多层次的”, “无限地重新确定中心。”(Landow, 1992)

超文本反映了后结构主义批判理论的没有中心的四处散布的自我表现(Landow, 1992: 76—77)。Landow 提示, 这样的思考是从当代通信技术的转变启发的: 旧的印刷技术鼓励单一的构成整体的自我理想, 而电子文本则鼓励多重的, 甚至互相冲突的声音。超文本提供一个移动中心的可能性, 一个“多中心的”或“无限地重新确定的中心”的文本空间, 其中心由一个主动的读者决定。中心有来有去, 确定临时中心的活动时时重复。

在超文本中, 中心, 像美和相关性一样, 存在于旁观者的思维中。超文本的中心像消散性那样存在。超文本的关于中心的分解使得媒体成为具有民主的潜能, 成为会话社会的模式, 其中没有一个会话, 一个学科或思想意识主宰其他或成为其他的基础(Landow 1992: 70)。

3.4 在政治和伦理决策中的协作性、民主性

印刷页面的线性语言欢迎的是简单的清楚的观点, 而多线性的超文本所提供的是多面的有时是矛盾的声音。没有一个超文本语篇是独唱的, 它总是与一个声音不调和的合唱团合作, 与许多其他网络接点联系。

正如 Landow (1992: 88) 所言, “在超文本环境中, 所有写作成为共同协作进行的写作。”“通过读者自己的选择产生文本时 主动的读者和作者协作。第二, 我们将这个作者和其他作者比较, 即“现在”正在写作的作者 and 所有在网络系统中的虚拟作者, ……”

Landow 根据他与同事和学生共同协作的经验, 宣称超文本孕育了真正从事探索的学院社团。超文本可以把教师和学生拉近, 达到同一水平, 促进学科间协作, 鼓励学院式教学和他们的研究的整合。这种精神体现了非阶级性和民主性。

将权利交到普通人民手中, 电子媒介具有民主

的惊人力量,它不再受极权主义的控制。像 Bolter 和 Landow 那样的理论家大胆作如下结论:信息技术历史对人类文化具有解放意义。Landow 说:

信息技术从书写到超文本的发展史显露出正在增加的民主化或权力的解体。写作开始这个过程,因为使记忆外化,它将知识从一个人的占有转换为多人的占有。如 Ryan(1980:29) 正确的论点:“书写可属于任何人,它终止了所有权或言语所指出的自我认同的特性。”信息技术的民主特点衍生自它们发散的信息和这样的发散所产生的力量。(Landow, 1992: 174)

在超文本话语中,在伦理和政治的决策中,超文本突出加强了读者的力量。作为一个弥散的多层次的网络,超文本可将互相矛盾的争论和解释结合在一起,它能“超越矛盾的各种可能性”。(Bolter, 1991: 143)这样,超文本提供了伦理和政治讨论得以进行的场所。(Landow, 1992: 169—78)例如, Gerald Graff(1990)建议对文学研究最聪明的反应是“教各种冲突的意见”与其试图一劳永逸地决定法规的形成,为什么将聚光灯移向对法规争论的过程?是争论成为聚焦,不是讨论结果所做的决定。Graff 说,法规的讨论来来去去,但是对权威、价值、规范、信仰和行为的讨论会永远存在。

3.5 口述和读写并重的电子话语

超文本是网络文本。网络的特性决定了破除建立层次或中央权威的努力。再者,对网络范式的移动包含了比超文本更多的东西,它重新界定我们整个文化。

……正如我们的文化从印刷书籍移向计算机,也是在从有阶级的社会秩序向我们称之为“网络文化”移动的最终阶段存在。数十年来,所有形式的级阶解体了,因为给个体以越来越大的自由。(Landow, 1992: 66—67)

政府、教会和家庭在法律中可保持地位,但它们几乎没有权威性了。网络代替了级阶组织(Bolter, 1991: 232)。超文本在电子网络中所采用的独特的交际形式是电子话语(e-discourse)(Nix-Jackson, 1998)。它之所以独特在于它存在于口语会话和从语境中抽象出来的书面文本之间的连续体(Foer-sch, 1998)。两个人说话可以有声有色,交换的不仅仅是词语。但电子网络正在改变我们与同伴读写和交际的方式。当我们在计算机键盘上敲词的时候,假如我们采用谈话(chat)或电子会议的方法,我们是在“真实时间”传送信息的。因此 e-chat 比 e-mail 更为自发。过去写作时带有口语味总被认为是学术性不强,这个看法正在改变。电子话语处在口

语和书面语之间,或者说,是两者的结合。例如,我们可以采用 FYI(for your information), ASAP(as soon as possible), BTY(by the way)等简略表达式,也可以辅之以情感符号(emoticon)。又如,过去把 literacy 一词理解为识字或读写,现在这个定义要改变了, literacy 将用来区别那些会电子话语的和不会电子话语者,犹如汉语中区分“文盲”和“机盲”。

3.6 空间扩展导致的开放性

在最初阶段,超文本只是对书面信息转而采用电子方法处理。这样,单一的原始文本成为阅读的主要对象,评论和附注是次要的,让读者自己继续解决。后来,有了一个或更多的语言或视听的文本,以书的形式分成若干信息片段,可以通过非线性的方式接触到。这样,印刷的百科全书变为多媒体的产品,文本的描写和图片信息结合起来了。多媒体和双向网络增加了信息的互相连接和整合的可能性,也模糊了使文化产品区分的各种因素。在互动网络中,文本不再是常规作品受时空封闭的实体,丧失了它的高傲性。根据使用图标系统的界面,它们可以成为动画化的实体,关系和直觉的动作,加上视听语言的普遍性,终于克服了以语言文本为基础的交际过程中的语言障碍。在这个基础上,有发展了虚拟环境,组成分属不同时间和空间的超感觉的信息,也就是说,文本有语言的、语音的、视觉的、视听的,或超感觉的。因此,超文本是开放性的作品。开放性的作品可成为新文化的基础,这个新文化意味着电视或电影屏幕的终结,书本或图画的终结。

4.0 评论

尽管 Landow 等对超文本做了全面的肯定的论述,持不同意见的也是有的。

Bond(1997)专门就 Landow 自己写的书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1992)进行评论,认为该书没有说明超文本发展的重要性,其原因不在于作者使用过多的学究式风格,而是没有按作者自己所宣扬的风格写。这表现在以下方面:(1)Landow 的书未发挥超文本的作用,对诸如范式、转移、解构主义者、后结构主义者、互文性、多声部、记忆扩展器、能指、所指等没有提供超文本那样的注解。(2)该书的超文本使引文点击所化的时间与查原文文件差不多时间。而且那个参考书目本身是封闭的,没有超文本链连接。(3)由于超文本链接未能真正增强阅读经验,人们只能下载该文件,以免在线阅读太费眼睛。但这个网址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费时间。(4)段落没有编号,大部分标题不易看懂,需要分别下载,包括那些重复的标题和附注。(5)在主文件可进行超文本链接的文章挂在内容页

的下面,但没有任何伴随的语境,使读者难以选择,什么东西都只能按次序浏览。

Wendelboe(online)认为超文本与 Derrida 的解构主义是有矛盾的。解构主义蔑视定义,强调歧义、隐蔽的隐喻和脚注,因此主张对一般读者所忽视的东西要仔细阅读,但超文本要与外部的信息联系,这样,读者处于超浏览的状态,对材料只能跳读,这与解构主义是格格不入的,其结果是抓不住真正的意义。他还认为,电子时代的信息成了娱乐的同义词,正像人们经常评论电视那样: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频道,要看的东西没有,老东西却一遍又一遍地重复?

最后,既然读者也可变成作者,必然出现如何对待抄袭的问题,也就是说,对原始超文本做多大规模的修改,才能成为“写手”们自己的作品?

参考文献

- [1] Bakhtin, M. M. *Problems of Dostoevsky's Poetics* [M] . Ed. and trans. Caryl Emerson.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8. 1963 (Russia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 [2] Bakhtin, M. M. “Discourse in the Novel.” *The Dialogic Imagination: Four Essays*[M] . Ed. Michael Holquist. Trans.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tudies 1. 1975 (Russi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1; 259—422.
- [3] Bakhtin, M. M. “The Problem of Speech Genres.” *Speech Genres and Other Late Essays*[M] . Trans. Vern W. McGee. Ed. Caryl Emerson and Michael Holquist.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lavic Series 8. 1979 (Russian).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86; 60—102.
- [4] Barlow, J. P. 1994. The economy of ideas [J] . *Wired* 203. March, 2003.
- [5] Barthes, Roland. *S/Z* [M] . 1970. Translated by Richard Miller.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72.
- [6] Berk, E. & J. Devlin (eds.). *The Hypertext/Hypermedia Handbook* [M] . Intertext Publications, 1991. 4.
- [7] Bolter, J. D. *Writing Space: The Computer, Hypertext, and the History of Writing* [M] . Hillsdale, N. 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1.
- [8] Bond, F. Hype or text? [J] . *Finger Prints*, 1997, 1(1).
- [9] Brent, D. E-publishing and Hypertext Publishing [J] . *Ejournal*, 1996, 6 (2).
- [10] Derrida, J. *Of Grammatology* [M] . Eng. Trans.,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76.
- [11] Foertsch, J. The impact of electronic networks on scholarly communication: Avenues for research [J] . *Discourse Processes*, 1998, 19: 301—328.
- [12] Foucault, M. *The Archeology of Knowledge* [M] . Translated by A. M.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Pantheon, 1972.
- [13] Foucault, M. *The Order of Things. An Archeology of the Human Sciences* [M] . New York: Vintage, 1973.
- [14] Foucault, M.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M] . Trans.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7.
- [15] Foucault, M. The concern for truth [A] . In Lawrence D. K. (ed.). *Politics, Philosophy, Culture* [C] .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255—267.
- [16] Graff, G. *Professing Literature: An Institutional History* [M]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 [17] Landow, G. P. *Hypertext: The Convergence of Contemporary Critical Theory and Technology* [M] .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92.
- [18] Lanham, R. *The Electronic Word: Democracy, Technology, and the Arts* [M] .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 [19] McLuhan, M. *The Gutenberg Galaxy* [M] .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62.
- [20] Nelson, T. *Literary Machines* [M] . Mindful Press, 1990.
- [21] Nix-Jackson, G. Electronic Discourse: Toward a Dialogic Framework for Scholarly Collaboration [J/OL] . Online. 1998, May 13.
- [22] Ong, W. *Orality and Literacy: The Technologizing of the Word* [M] . London: Methuen. 1982.
- [23] Rowe, K. R. Derrida and Hypertext Today English 111 [J/OL] . Online, 1999.
- [24] Ryan, M. *Marxism and Deconstruction: A Critical Articulation* [M] .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P, 1980.
- [25] Wendelboe, K. Hypertext: Savior or Martyr [J/OL] . Finger Prints.
- [26] Whitehead, J. Orality and Hypertext: An Interview with the Hypertext Culture [J/OL] . Online. 1996.